

政治无意识:理论构成与阐释实践

杨建刚

【摘要】詹姆逊提出的“政治无意识”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詹姆逊提出“政治无意识”的目的是对当时美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新批评与历史化学派之间的矛盾予以介入和回应,并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詹姆逊对精神分析的“无意识”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符码转换”,并与“政治”相嫁接,形成了“政治无意识”理论。这种理论以“政治”为主符码,强调历史化方法,认为政治和历史都必须经过文学的形式化,才可以成为文学中的“政治无意识”。以探寻文学中的“政治无意识”为目标,詹姆逊提出了一种“三个同心圆”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模式。这种阐释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充满空间想象的文学认知理论。

【关键词】政治无意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

【作者简介】杨建刚,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出处】《天津社会科学》,2021.4.123~13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及当代意义研究”(项目号:18ZDA27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范式转型研究”(项目号:20BZW025)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项目资助。

“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又译詹明信、杰姆逊、詹姆森)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其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中具有枢纽性的重要作用,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旧有的新批评的内部研究与新兴的历史化学派的外部研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①。在与西方诸多理论流派的比较中,詹姆逊发现,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文学理论和批评“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可以为克服这一矛盾提供“在哲学上符合逻辑的、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信服”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相容的批评操作,在它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②。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理论品格的认识,詹姆逊试图将当时有价值的理论和学说都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之中,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为詹姆逊奠定学术基础的主要是结构主义、西方马克

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派。三种理论在詹姆逊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为其文学批评提供了“叙事分析的政治维度和历史维度”,结构主义为其文学批评提供了“叙事分析的逻辑维度和语言学维度”,那么精神分析则为其文学批评提供了“语言投射和愿望满足的维度”^③。这种知识图谱在詹姆逊早期的研究和著述中呈现得比较清晰。在《语言的牢笼》中,詹姆逊认为,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的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都试图“以语言为模式,按照语言学的逻辑把一切从头再思考一遍”,而这种模式在带来了文学理论“内部研究”兴盛的同时,又难以避免地陷入了一种“语言的牢笼”。要走出这种“语言的牢笼”,就必须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方法,将文学理论重新向历史和政治开放,这样才能使“共时分析与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等问题之间的矛盾得以调和与解决^④。进而,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在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和萨特等人

的著作中发现了一种“内部形式”或“形式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辩证批评”的理论构想。在随后对路易斯的作品展开分析的《侵略的寓言》中，詹姆斯首次提出了“政治无意识”这一概念，并通过引入精神分析视域对辩证批评进行了完善。在这部作品中，詹姆斯指出，在当代文学理论思潮中，意识形态、心理分析和叙事分析“构成了一个坐标”，并为研究“一种新近最罕见、最难理解、最鲜为人知的英文小说构建一种阐释模式”。因此，要研究路易斯作品中的“政治无意识”，“就必定迫使我们把叙事分析、心理分析和探索意识形态的传统和现代的方法联系起来”^⑤。紧接着，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斯以“政治无意识”为核心范畴，通过对当时的诸多理论和学说加以辨析和融通，以及对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等人的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中，建构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可以说，“政治无意识”理论的出场，不仅是詹姆斯对当时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矛盾和张力进行反思与回应的结果，也是他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的重要步骤。虽然詹姆斯将“政治无意识”作为其代表作的名称，并在书中多次提及，却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因此，要把握“政治无意识”的内涵，就需要在詹姆斯对诸多流派、著作和文学作品的分析与评述中，对这一关键词的理论构成和阐释实践进行梳理和辨析，从而勾勒出一个以“政治无意识”为关节点的理论图谱。

一、“无意识”的谱系及其符码转换

在詹姆斯对精神分析的借用中，无意识和欲望是最关键的两个术语。詹姆斯主要在其文学理论中借用了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而将拉康和德勒兹的欲望理论运用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从理论构成来看，显而易见，詹姆斯的“政治无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与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的综合。虽然马克思关注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弗洛伊德所关注的则是个人主体隐秘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结构，但这种差异并没有成为二者之间进行对话与融通的障碍。事实上，在对话中吸纳和借鉴精神分析的理论学说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比如，弗洛姆就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之间“共同的基础”。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和弗

洛伊德都认为人是不自由的，只有摆脱奴役人的力量的束缚，人才可以获得自由并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不同在于，马克思认为这种奴役人的力量是外在的异化的社会历史，而弗洛伊德则将这种力量的本质归结于人内在的生理上的力比多或生物学上的死本能或生本能^⑥。威尔海姆·赖希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思考一种“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试图借此发现法西斯主义盛行的大众心理机制^⑦。马尔库塞在吸收精神分析的欲望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爱欲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和“新感性”的社会批判意义。阿尔都塞则采用精神分析的“症候分析法”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发展出一种文学批评的“症候阅读法”^⑧。正是这种对精神分析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的吸纳与借鉴，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潮。尤其是，在20世纪中期的欧洲理论界，伴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相嫁接的知识传统又不得不加入结构主义的维度。福柯对这一状况进行了描述：“在1945-1965年间(我指的是欧洲)，横亘着某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某种政治话语的样式，某种知识分子伦理学。人们不得不去亲近马克思，人们不能够偏离弗洛伊德太远。而且，人们还不得不对符号系统——能指表示出最大的敬意。这三方面的要求奇怪地盘踞了写作和言说的领域，成为广为接受的衡量个人及时代的真理。”^⑨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这三者之间寻求融合，成为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方法论，也是詹姆斯学术起步阶段所面临的知识状况。“政治无意识”理论就是他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以结构主义为中介，对精神分析的“无意识”学说进行符码转换的结果。

哲学家们往往将创造新概念作为哲学话语创新的主要途径。但是，在詹姆斯看来，创造新概念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更喜欢对已有的概念和范畴进行符码转换^⑩。所谓“符码转换”，即“发明一套术语，或战略性地选择一些特殊的符码或语言，如此同样的术语便可以用来分析和连接两种迥然不同类型的客体或‘文本’，或现实的两个非常不同的结构层面”^⑪。詹姆斯习惯于把其他批评理论的符码置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外延，从

而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术语。詹姆斯对精神分析的“无意识”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符码转换”，并与“政治”概念相嫁接，形成了其文学批评中的核心范畴“政治无意识”。

虽然在弗洛伊德之前“无意识”已经被哲学家们所使用，但是弗洛伊德赋予其独一无二的原创意义。弗洛伊德区分了作为“形容词”和“名词”的两种不同的“无意识”。作为形容词的“无意识的”主要用于描述主体“活动于某一时间，而在那一时间之内我们又一无所觉”的“心灵历程”，而作为名词的“无意识”则是与意识和前意识并列的、与人格结构中伊底(id)相对应的心理结构的层次^②。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研究就是试图揭示意识和前意识对无意识的压抑机制，以及通过对病患的行为失常、口误、梦境等症候的分析与解读，来发现和挖掘其精神结构中的无意识世界，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弗洛伊德通过患者的语言陈述中的症候来探究隐藏于其无意识中的创伤的方法为雅各布森所发展。雅各布森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引入结构主义语言学，分析了语言中的无意识、失语症及其与诗学的关系^③。拉康接续、推进了雅各布森的研究，将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入精神分析，并认为“精神分析在无意识中发现的是在言语之外的语言的整个结构”^④。无意识必须借助语言才可以被把握，我们所能把握到的也只是被语言所表述出来的部分。梦的解析的对象并不是梦本身，而是对梦的内容的语言表述。因此，在拉康看来：“梦是个字谜……梦中的形象只是由其能指的价值而值得注意，也就是说由其可使我们读出梦的字谜所建议的‘谚语’的能力。这个使解读的行为成为可能的语言结构就是梦的意义的根源，就是释梦的根源。”^⑤这样，拉康就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进行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释，认为在本质意义上，“无意识是一个能指的连环。这个连环在某个地方(他说的在另一个舞台上)不断重复和持续，为的是在断裂中和思考中起作用”^⑥。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都非常重视文学艺术，并将它作为精神分析的“理想地点”。正是出于这一点，朗西埃认为，“艺术和文学领域可以定义为‘无意识’得以运行的特有领域”^⑦，因为在文学艺术中，“没有一个情节、一个描写或一

个句子不承载着整个作品的意义表达。没有任何东西不会不带有语言的力量”^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无意识又与语言同构，这就使文学艺术的精神分析研究成为可能。弗洛伊德、雅各布森和拉康对无意识、语言和文学艺术的关系的论述，为詹姆斯借用精神分析话语，尤其是无意识理论做了理论准备。詹姆斯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无意识模式”作为其政治无意识建构中的范例。但是，他并不是直接运用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概念，而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符码转换，舍弃了无意识的个体心理层面的欲望逻辑，保留了其得以运作的压抑机制，以及阐释无意识的“症候分析”方法，并与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相融通。在其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中，詹姆斯将弗洛伊德的欲望转化为意识形态，而将其压抑机制转化为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症候阅读”则是其识别并挖掘文本深层政治无意识的主要方法。通过这种符码转换，詹姆斯试图阐明“政治”(具体指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中的运作机制及其阐释路径。显而易见，詹姆斯的政治无意识放宽了无意识的原始概念的范围，指向的并不是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也不是荣格的作为原型贮藏所的集体无意识，而更像本雅明所说的历史的梦魇^⑨。玛丽·托马斯·克莱恩对这一路径进行了准确描述：“詹姆斯沿着拉康和阿尔都塞的路径拓展了无意识理论，不再将无意识视为个体受压抑的情感和欲望的容器，而是将其看作受压抑的政治和社会矛盾的更广泛的语言和文化的发生地。”^⑩文学文本是政治的载体，但是，文学中的政治不只是内容层面说教式地清晰显现，其深层的微观政治像无意识隐藏于心智结构的最深层而不被意识所捕捉一样，是无法一目了然的，只有通过文本的语言形式、叙事技巧、话语修辞、人物命运等进行症候阅读，才能挖掘出其“形式的意识形态”和文本深层的“政治无意识”。

二、“政治无意识”的多重内涵及其整合

显然，詹姆斯的“政治无意识”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用以阐明文学艺术中“政治”的存在形式和运作方式。如果对詹姆斯有关“政治无意识”的复杂论述加以梳理和辨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术语所包含

的多重内涵。

第一,“政治无意识”的核心符码是“政治”。

政治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关切对象,政治价值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价值指向。伊格尔顿指出,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不存在没有政治的批评,只有政治内涵的差异而已^①。詹姆逊持同样的观点,坚持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②,政治是“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在文学研究中具有阐释的“优越性”^③。正是从这种绝对的政治视域出发,詹姆逊认为巴特所提出的文本阅读的“快感”“在‘讽喻’的意义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④。不同之处在于,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政治的内涵发生了由狭义的阶级政治向广义的文化政治的转变^⑤。詹姆逊将文学看作一种“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其“政治批评”显然包括了政治的这两个方面的内涵,甚至更加宽泛。

在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和文学批评活动中,詹姆逊往往把“政治”具体化为“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分析仍然适于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批评‘方法’的名称”^⑥。詹姆逊将思想史上的“意识形态”概括为七种模式^⑦。在以“政治无意识”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中,詹姆逊不同程度地运用了意识形态的多重内涵。其中,在文学本质问题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詹姆逊影响最大。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不只是统治阶级用于压迫和蒙蔽大众的狭义的“虚假意识”,也不只是用于团结和激励无产阶级的“乌托邦”幻想,而是在中性意义上将意识形态看作“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⑧。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作为一种虚构和想象的语言艺术,也就成为意识形态的天然载体。因此,阿尔都塞指出,艺术不是政治宣传,也不是宗教布道,而是借助特殊的语言形式“使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以‘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的形式(不是以认识的形式)所给予我们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着的那种意识形态”^⑨。阿尔都塞的弟子马歇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离心结构”。詹姆逊继承了阿尔都塞和马歇雷的意识形态理论,将“文本的意识形态”作

为研究对象。同时,他又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想象性关系”,将文学看作一种更为广义的“社会象征性行为”。

第二,“政治无意识”的方法论是“历史化”。

詹姆逊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作为其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了文学批评要“永远历史化”的口号。这种历史化包括对立的两个视角,即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前者延续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强调历史的叙事性;后者则突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方法,认为“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⑩。詹姆逊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之所以陷入了“语言的牢笼”,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形式文论所秉持的反历史倾向,新批评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所谓的共时研究所关注的也仅仅是历史长河中某一时段的社会和文化结构,而历史则是这种共时结构的线性链接。“历史”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用以阐释特定文本的参照,而且是所有阐释都不可回避的“绝对视域”。相对于文物研究、存在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和尼采式反历史主义这四种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詹姆逊认为,“生产模式”理论可以克服这些理论的种种缺陷,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因此成为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的重要方面。

第三,“政治无意识”强调政治和形式的形式化。

詹姆逊指出:“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宏大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须先将它文本化,以政治无意识将它叙事化。”^⑪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都必须经过文学形式的重构和形塑,才能够成为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詹姆逊这一观点的形成显然与新历史主义和后经典叙事学有关。在注重语言结构分析的形式主义学派和注重社会政治历史的历史文化学派的矛盾中,新历史主义和后经典叙事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矛盾进行了调和。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叙事化,而后经典叙事学则出现了明显的政治转向,意识形态叙事成为其核心命题。如果说经典叙事学“将文本解读作

为语言学知识或语言解读的讽喻”,认为“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统统在语言的视野之中”,那么后经典叙事学则致力于“在文本中找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无意识”,认为“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统统在政治的视野中”^②。詹姆逊对这两种理论倾向都非常熟悉,并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中加以综合运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本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但詹姆逊从中发现了作为“叙述大师”的马克思,认为“在他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有十分精彩的叙事技巧,一方面是讲故事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对哲学故事进行解构,其复杂之处绝不亚于任何现代派小说”^③。正是基于对政治、历史与文学的审美形式之间统一关系的清晰认识,詹姆逊指出:“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和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我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④。伊格尔顿对这种将政治(意识形态)、历史和形式相统一的批评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既可以避免纯粹的“形式主义”,又可以摆脱“庸俗社会学”^⑤。学界因此也将詹姆逊的文学批评的特点概括为“社会形式诗学”。

不同于西方以《圣经》阐释为源头的哲学和宗教阐释学,詹姆逊的“社会形式诗学”通过解读和阐释来发掘文本内部的政治、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政治无意识。用詹姆逊的话来说:“正是在探寻那种未受干扰的叙事的踪迹的过程中,在把这个基本历史的被压抑和被淹没的现实重现于文本表面的过程中,一种政治无意识的学说才找到了它的功能及必然性。”^⑥因此,虽然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伽达默尔等人的哲学解释学传统影响巨大,但是,在詹姆逊试图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中,他并没有将哲学解释学作为最重要的理论资源,而是关注与文学艺术更加密切的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所进行的都是阐释学的工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雅明、马尔库塞和布洛赫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变体”,以罗兰·巴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本质

上就是“一种真正的阐释学”,而“近代最具影响、最细密的阐释体系是精神分析学的阐释”^⑦。每一种阐释学都有自己的主符码,其文学批评就是通过这些主符码从不同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强有力的”重写。如果说结构主义的主符码是“语言”和“结构”,精神分析的主符码是“无意识”和“欲望”,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主符码则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在对作为其思想枢纽的“政治无意识”的讨论中,詹姆逊对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主符码”进行了符码转换,从而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轴,以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为两翼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

三、“政治无意识”的阐释模式及其批评实践

在与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等阐释模式的比较过程中,詹姆逊提出了“三个同心圆”的“政治无意识”阐释模式,并通过对路易斯、巴尔扎克、吉辛和康拉德等人的作品的分析对这一阐释模式进行了实践。

詹姆逊对弗洛伊德的阐释方法的接受,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保罗·利科的影响。保罗·利科区分了“作为意义回想的解释”和“作为进行怀疑的解释”。前者以《圣经》和宗教解释学为代表,后者则以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所构成的“怀疑学派”为代表。利科指出:“对于三位大师来说,意识的基本范畴是掩饰—显示的关系,或者如果喜欢的话,是伪装—表达的关系。”^⑧那么,对意义的探寻,就不能仅限于对文本显示的语言表达的辩读,更要借助各种方法去揭开语言的伪装,去发掘被语言表达所掩饰和隐藏的意义或政治无意识。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就是将梦看作一个“文本”,借助梦者对梦境的陈述中的种种症候,去还原和重构梦的内容,并借此探究梦者的无意识精神世界。阿尔都塞将这种方法加以马克思主义转换,发展一种用于文学阐释的“症候阅读法”。在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中,文学被作为一种连续的、同质的、统一的、“总体性”的语言文本,在社会历史的总体框架中展开对作品的意识形态批判,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方法。但是,在詹姆逊看来,经过了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的洗礼,这种总体性文学观念已经逐渐受到质疑,代之以一种强调断续性、异质性和分散的美学原则。

揭开蒙在文本外表上的伪装,从文本的断裂、缝隙、褶皱中探究不能被言语所直接言说的政治无意识,就是其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的主要任务。

在詹姆斯看来,精神分析关于个体欲望的阐释机制对于作为欲望主体的传记作家和文学人物的研究颇具解释力,但对集体欲望的阐释却显得乏力,因此他将目光转向了弗莱的原型批评。弗莱的阐释模式包括了四个层面,即直义的、寓言的、道德的和神秘阐释的。这四个阐释层面是由作品的语言表意向政治意义的逐步延伸。《圣经》解释学往往把耶稣的个人事迹作为人类集体命运的象征和寓言,其最终试图阐明和传达的是基督教义及其政治意义。从阿尔都塞提出的历史哲学的三种因果律角度来看,詹姆斯认为,弗莱的阐释模式所遵循的显然是一种表现因果律,而戈德曼的“异质同构”理论也属于一种“简单化的机械模式”。

詹姆斯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文化阐释方法作为“充分理解文学的必要先决条件”,并将其他几种方法的合理成分加以吸收和转化,建构了自己的“三个同心圆”阐释模式。

最内层是政治历史层,关注于“狭义的定期发生的事件和类编年史的系列事件”,具体到文学艺术上,就是以文学文本自身为研究对象,将个别作品解读为相应的政治和历史事件的“象征性行为”。比如,在《吉姆爷》中,康拉德实际上是借主人公吉姆的命运讲述一个“关于勇敢和胆怯的故事,一个道德故事”,而借蝴蝶收藏家斯坦所讲述的则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英雄时代的正在逝去的故事”。因此,在詹姆斯看来,在文学中,人物的生平及其故事实际上都是其时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象征性呈现。

中间层是社会层,关注于“社会阶级之间的构成性张力和斗争”,将个别文本或作品“重构成伟大的集体和阶级话语,文本不过是这些话语的个别言语或表达”,文学阐释的目的就是辨析和解读文本中作为“社会阶级本质上不相容的集体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的“意识形态素”。在文学作品中,人物、情节、结构、修辞和主题等都扮演着意识形态素的角色,成为“意识形态的符号”。在马克思所分析过的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中,詹姆斯认为:“校长这个人物

具体体现的焦虑是19世纪中产阶级对暴民的原始恐惧。对校长的惩罚就是对前工业时代的城市暴民被制度化永久破落的无产阶级时所释放出来的焦虑的严酷的‘解决办法’,暗示了被吓坏了的有产阶级所愿意采取的手段”^⑨。在吉辛和康拉德的作品中,愤懑作为意识形态素,“似乎在‘心理的’和非物质的方面解释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破坏性嫉妒,因此也说明了人民大众反抗等级制度的否则便不可解释的事实”^⑩。

最外层是历史层,关注于更为宽泛的“一系列生产方式,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社会构造的接续和命运”。文学艺术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物,并通过特殊的形式化方法再生产着这种生产方式。从这个层面来看,“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形式的意识形态”是这个层面的文学阐释的核心问题^⑪。文类及其叙事方式是文学中“形式的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并在文学与生活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传奇作为一种古典文类,“是一种愿望满足和乌托邦幻想,旨在改变日常生活世界,以便恢复某个失去的伊甸园,或期待一个将消除旧的灾难和缺憾的未来王国”^⑫。小说则不同。作为一种现代文类,小说“并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而是一种象征行为,而作为一种象征行为,它必须把异质的叙事范式统一或协调起来,尽管这些范式有其自己独特的、矛盾的意识形态意义”^⑬。文学的叙事策略同样是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狄更斯的文学叙事中包含了“伤感的”和“戏剧的”这两种不同但却并不相互排斥的叙事策略。詹姆斯认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两种策略实际上体现的是“19世纪中产阶级对下层社会萝卜加大棒式的道德化”^⑭。

如果说“三个同心圆”是詹姆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的基本框架,那么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政治批评方法与精神分析和形式批评相结合,则是其分析文学作品、揭示文本深层“政治无意识”的主要路径。在詹姆斯看来,路易斯作品中充斥着“明显不同的性别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对立、童年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古老幻想与意识形态信奉之

间的对立、幼儿的心理满足与成人的‘价值’之间的对立”，而这些对立都“投射并强化了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心理化和主观化的意识形态”^⑤。同时，路易斯作品中的“句子—生产”也都是“一种自身构成的象征性行为，一种在词汇本身层面上具有爆炸性与突破性的实践”^⑥。通过分析，詹姆逊发现，对文本中的政治最深层次的理解和阐释最终都要落实到心理和形式层面，对心理世界的分析依赖于精神分析，对形式结构的研究则是形式主义的专长。在詹姆逊用于探讨文本中的“政治无意识”的阐释方法中，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最佳结合是“症候阅读”，而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则是其形式分析的主要方法。格雷马斯运用符号矩阵分析“自然界和文化之间的原始对立”和人类文化的“深层结构”，詹姆逊却将它作为其文学阐释和批评的一种屡试不爽的意识形态分析方法，并从中发现了“政治无意识”的运作方式。

结语

詹姆逊提出了意义阐释的四种“深度模式”，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现象与本质的区分、精神分析对“明显”与“隐含”的区分、存在主义对“本真性”与“非本真性”的区分，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对能指与所指的区分^⑦。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这四种“深度模式”，并将其运用于对文本深层的“政治无意识”的阐释之中，主张通过对文学“表层”的语言形式的分析而达到对“深层”意义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所依赖的是一种“表层”与“深层”相对立的“空间想象”，其阐释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文学的“认知理论”^⑧。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而意识形态的内涵由否定性向肯定性的转化以及诸多理论家不同角度的阐释，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讨论不断深入。不同于恩格斯将文学作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⑨，列宁、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将文学作为建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途径，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及其文学阐释学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阿尔都塞所说的人与现实的“想象性关系”和马歇雷的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离心结构”，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推进

和深化。

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不仅为他带来巨大声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政治无意识”已经成为一个极具生产性的概念，借用“政治无意识”进行文学批评的成果日益增多，研究对象既包括张爱玲、严歌苓、洛夫、汤亭亭、贾平凹、王蒙、巴尔扎克、霍桑、福克纳、贝娄、劳伦斯、马克·吐温、约瑟夫·海勒、乔治·奥威尔、藤泽周平等中外作家的作品，也涉及科幻小说、红色经典、女性文学、当代电影、绘画、戏剧、散文、诗歌等文学类型研究，更有中国新闻史、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文明等级论等跨学科话题，不一而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很多成果都只是通过借用“政治无意识”这一概念来表达文学中“政治”无处不在，而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并没有真正掌握这一概念所代表的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或“社会形式诗学”的理论导向和方法论意义，即将政治、历史和形式融为一体，强调共时与历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语言形式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并在具体批评中将政治分析、心理分析和形式分析相结合。与詹姆逊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相结合类似，赵宪章由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进入西方形式美学研究，进而将这两种方法论融合到其文学文体和文学图像研究中。他反对“超越形式直奔主题”，而是倡导“通过形式阐发意义”，试图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形式分析发现仅仅通过内容分析所发现不了的独特意义^⑩。他对《美食家》《大话西游》等作品和日记体、书信体、戏仿体、语图互文等的形式分析即是这一方法论的批评实践。赵宪章倡导的“通过形式阐发意义”与詹姆逊的“从形式入手研究内容”的文学研究方法极为接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及其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和“社会形式诗学”，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方向。这个方向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未来发展中需要吸收和借鉴的。

注释：

①弗兰克·伦特里奇亚：《新批评之后》，王明丽等译，南京

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②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③吴琼:《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1页。

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朱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0页。

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侵略的寓言》,陈清贵、王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⑥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118页。

⑦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⑧参见汪正龙:《症候阅读:从哲学研究到文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⑨米歇尔·福柯:《〈反俄狄浦斯〉序言》,麦永雄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7期。

⑩杨建刚、王弦、弗雷德里克·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⑪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22页。

⑫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5~57页。

⑬参见赵晓彬、韩巍:《失语症·无意识·精神分析——论雅各布森对诗学研究的独特贡献》,《外国文学》2012年第4期;马元龙:《无意识就是大写他者的话语——论拉康的无意识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⑭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92页。

⑮雅克·拉康:《拉康选集》,第407页。

⑯雅克·拉康:《拉康选集》,第562页。

⑰雅克·朗西埃:《审美无意识》,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⑱雅克·朗西埃:《审美无意识》,第23页。

⑲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孙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⑳Mary Thomas Crane, "Surface, Depth, and the Spatial Imaginary: A Cognitive Reading of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Representations, 2009(1).

㉑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㉒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4页。

㉓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1页。

㉔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㉕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4页。

㉖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前言,第4页。

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58页。

㉘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61页。

㉙阿尔都塞:《一封关于艺术的信》,载陆梅林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521页。

㉚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第4页。

㉛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17页。

㉜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㉝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5页。

㉞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㉟Terry Eagleton and Drew Milne(eds.),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Oxford UK &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p. 11.

㊱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3页。

㊲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40页。

㊳保罗·利科:《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汪堂家、李之喆、姚满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184页。

㊵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197页。

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53~57页。

㊷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99页。

㊸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132页。

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182页。

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侵略的寓言》,第7页。

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侵略的寓言》,第6页。

㊼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82~183页。

㊽Mary Thomas Crane, "Surface, Depth, and the Spatial Imaginary: A Cognitive Reading of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Representations, 2009(1).

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

㊿赵宪章:《形式美学与文学形式研究》,《中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